

近代音乐知识的生成脉络： 基于晚清音乐教科书出版路径的考察

赵庆文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在构建近代中国音乐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进程中,音乐教科书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作为近代音乐教科书出版的肇始,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版经历了从英美教会零星出版,到以日译教科书编译为主体,再到教科书中国本土化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不但反映出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话语脉络,也指示出该脉络中隐藏的东、西洋文化权力的竞争关系。

关键词:音乐教科书;晚清;编纂出版;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4-0036-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404

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是当代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核心议题^[1]。讨论当代中国音乐学的理论话语体系,离不开对中国近代音乐学话语体系的梳理与反思。作为一种独特的体系化知识,近代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版不仅直接参与、推动了近代音乐学科、话语、知识体系的构建,其背后隐藏的知识生产及传播脉络更反映近代跨文化传播进程中的文化权力关系。本文所使用的“近代”概念主要是指清季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相遇以来的历史过程。具体而言,本文讨论的时间范畴是指新教传教士来华至清末中国音乐学科确立的这一时段。

晚清是西方音乐学传入与中国近代音乐知识体系化、学科化的关键时期,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在提供一种广泛认同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引申出一系列复杂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然而颇令人遗憾,学科史研究中对教材的关注多集中在历史、地理等学科,对音乐教材的系统研究为数尚少。笔者所见相关研究仅有孙继南《中国第一部官方统编音乐教材—〈乐歌教科书〉的现身与考索》(《音乐研究》,2010年第3期),吴小鸥、张瑞《沈心工对中国新式教科书之贡献》(《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4期),程征《从官编音乐教科书看清末“国家主义”音乐教育思想的初兴》(《中国音乐》,2022年第5期)少数几篇专业论文对该问题有所涉及。总体来说,既有音乐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相对滞后,难以全面、准确理解近代西学背景下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有鉴于此,本文不揣浅陋,拟以清季知识“仓库”之一的音乐教科书为突破口,从其出版路径观察晚清音乐知识建构背后的权力话语,以期阐明近代音乐知识的生成脉络。

收稿日期:2022-10-13

作者简介:赵庆文(1978—),女,甘肃兰州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近代中国音乐术语的生成、演进与系统表达”(16YJA760053)。

一、晚清西方现代音乐输入的“英美路径”

晚期是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关键时期,西学东渐是讨论中国音乐学转型或确立不可忽略的重要背景。19世纪下半叶的西乐东传构成了近代中国与西方音乐的最初相遇,拉开了西方音乐知识跨语际传播的帷幕。作为早期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英美传教士充当了晚清西方音乐跨文化传播的代理(agent)。从知识传播的路径上看,早期音乐知识的输入体现出鲜明的“英美路径”。这一时期传教士多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从英美教会中使用的圣诗曲谱,根据实践教学的需要简单整理改编,呈现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传者”特征。

(一)早期西式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尝试

在晚清的音乐知识仓库中,具有一定知识权威的教科书,在知识代际传承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早期以宗教传播为主体的音乐传播中,事实上并无“教科书”这一概念。不过出于宗教崇拜的目的,传教士为教授圣诗而编纂的赞美诗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教本”的功能。19世纪初期,宗教赞美诗集即已在中国沿海各地陆续出版。据伟烈亚力统计,从1818年至1867年的50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共编译赞美诗计有41种。据笔者所掌握的教会出版物书目索引,1868年至1911年间,基督教所出赞美诗至少在56种以上,两者合计总数将近百种^[2]。这些赞美诗集主要直接从英美圣诗集直接翻译,大多以文理或方言完成,旨在跨越传教过程中的“巴别塔”困境,明显体现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适应策略。在内容上,虽偶有传教士自己创作的作品,但数量较少,更不乏挪用、转译的情况。

这些赞美诗集中,部分诗集除了纯粹的圣诗外,也收录了简要的音乐理论和唱法教授。从编辑目的上看,编纂者显然是想让这些诗集发挥“教科书”的功能,从而帮助受众掌握基本的西式乐理以习得唱法。事实上,部分传教士也的确直接将这些乐理著述充当教会学校音乐教材,从而产生了最早的西式音乐教科书雏形。典型的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应思理(Elia B. Inslee)1858年编纂出版的《圣山谐歌》,该书除有圣诗外,就附有5页的“唱言缕晰”。所谓的“唱言缕晰”就是用于习唱的西方乐理简介。应氏后来在杭州创办男女书塾,就曾开设音乐课程,且直接使用《圣山谐歌》作为教材^[3]。

早期的赞美诗集基于实用的考虑,记谱方法或用五线谱,或用 Tonic Sol-fa 谱,部分还采用简谱或工尺谱,种类繁多,反映出西方音乐初传中国的繁杂性和多样性。苏格兰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就是 Tonic Sol-fa 记谱法的代表。他分别编有《养心神诗》(1868年,厦门)、《乐法启蒙》(1868年-1870年间,厦门)、《乐理颇晰》(1870年,厦门)、《西国乐法》(1870年代初,不可考)四书^[4]。杜嘉德的哥哥就曾提到,杜嘉德在厦门期间,为了教民和学生能唱好圣诗,特意编写了一本“Sol-fa”歌谱。只要时间允许,他就用这本书来教学生,结果很成功^[5]。杜嘉德主导的“主音嗖乏”教学法也成为早期传教士音乐教法的典型代表。

早期赞美诗集的编纂出版,虽不能算得上是严格意义的“教科书”,但却可视作早期西式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尝试,不少作品在宗教传播实践中也的确发挥了“教科书”的功能。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音乐活动大抵是近代最早开展西方音乐教育的实践之一,也是西方音乐知识跨文化系统传播的最初尝试。这些早期赞美诗集的出版,客观上有助于推动西方乐理知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

(二)教会学校西式音乐教科书的编纂

教科书的编纂往往与学校教育紧密关联。随着基督教涉足中小学教育,晚清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得以陆续开展,众多教会学校纷纷设立音乐课程,并着手编纂用于教学的教科书。作为系统性、规范性的

西方音乐知识体系,这些教科书成为西方音乐知识在中国系统传播的主要途径。近代中国音乐教育发端于基督教会学校。早在 1844-1845 年间,马礼逊学校课表中就显示开设有声乐课程。此后,宁波、上海的一些学校也纷纷开设音乐课程。倪维思夫人(Mrs. John L. Nevius)回忆说:“到宁波六个月后就开始在他们所办的两所寄宿学校教唱歌。”一年之中,她教过“大约 40 个男童,30 个女童”“每周在教堂聚集两次”^[6]。1857 年,晁德莅神父报告上海徐汇公学进步较快的学生会加开例如法文、唱歌、音乐、图画等学科课程,而学生对这些学科的兴趣与接受能力,让老师们感到惊奇^[7]。不过上述记述只简约提及音乐教育,并未谈到音乐教科书的使用。据笔者所见,较早提及教科书使用的是傅兰雅(John Fryer)。1861-1863 年间,傅兰雅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教授音乐,他在一封信中就提到其时使用的教科书,他说:“这一‘变调图’是我先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因为只有一本教科书,我只好把教学内容统统都抄到黑板上,教完后,让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连例子和文字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在第二年年底,学生还在圣保罗书院公共会考时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所有的节目都选自先前使用的这本教科书^[8]。按傅兰雅的习惯,这本教科书也应该是采取 Tonic Sol-fa 记谱。

在其时教会学校中,知名度较高、使用较普遍的音乐教材是 1872 年狄就烈(Julia Brown)所编《西国乐法启蒙》。狄就烈是著名传教士狄考文的夫人,她于 1864 年到达登州传教,当年秋始在免费义塾中教授音乐。1872 年,登州蒙养学堂改为“文会馆”,学制分为备斋与正斋两类,备斋第二年课程中即有“乐法启蒙”课。是年,狄就烈出版《西国乐法启蒙》以作该科教材。《西国乐法启蒙》出版后,1879 年曾补编印行,1892 年再作增补重印,改名为《圣诗谱(附乐法启蒙)》。题名《圣诗谱》显然又回到基督教赞美诗的传统之中,所不同的是,这本《圣诗谱》附录的“乐法启蒙”采用了西方音乐的基本理论。1907 年、1913 年,《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再次重印^[9]。由此足见这本音乐教材在教会学校中使用之广泛。

1877 年 5 月,基督教在华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负责编辑审定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委员会决定编辑初、高级两套学校教材,初级教材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其中就包括音乐(声乐、器乐)科目教材^[10]。据 1877 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总干事韦廉臣提交的报告显示,其时编辑全部教材 49 种,音乐类教材采用的是狄就烈编的《声乐与器乐》^{[11]233-234}。1880 年,该委员会报告学校所用教科书共 63 种,科目内容大为扩充,音乐类的教科书仍然沿用《声乐与器乐》^{[11]235-236}。《声乐与器乐》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第一本正式的“教科书”。

除纯粹的音乐教材外,教会方面还曾出版与音乐学相关的《声学须知》《声学揭要》等书。上述各书严格意义上属于物理学,但却与乐理知识相关。《声学须知》系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编撰的丛书《格致须知》中的一种,主要以物理方法分析声音的原理,略有论及音律^{[12]377}。是书出版后,也被各类学校普遍用作声学知识的普及性教材^[13]。《声学揭要》最初由山东登州文会馆出版于 1893 年,次年轻益智书会校订改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该书是从当时欧洲流行的初级物理教科书——法国人加诺著《初等物理学》(Elementary Treatise on Physics)英译本第 14 版节译而来。该译本最早在登州文会馆采用,用于向学生讲授浅显的声学常识。至 1907 年时,美华书馆已出版至第三版。

总体而言,早期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开启了西方音乐知识系统输入的帷幕,揭示了以英美为主要源头的现代西方音乐知识的输入路径与历史逻辑。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教科书作为一种规范化、系统化的西方音乐知识发挥着特殊作用。不过,基督教出于传教目的对西方音乐知识的整理、制作、编纂,因其传播主体以传教士为主,传播空间也多局限在较为封闭的教会内部,是以较难跨越中西文化的屏障,难以激发中国受众的接受主动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方音乐知识的传播效果。

二、清末现代音乐知识的传播转向

自 19 世纪早期东西方文化的最初接触始,西方音乐知识的传播一直以英美为主要知识来源。这种自西徂东的流动过程历经近百年,受日本明治后新音乐运动的影响,在 20 世纪初出现明显的传播转向。清末现代音乐知识的传播转向,指示了中国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另一种话语脉络,也揭示了近代知识流动背后隐藏的东、西洋文化权力的竞争关系。

(一) 日本音乐运动的刺激与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通过推行“王政复古”,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采取了明显的革新举措,直接刺激了日本的现代音乐运动。19 世纪下半叶始,西方音乐开始大规模进入日本,日本在吸收欧美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推进音乐的现代转型。明治四年(1871),明治政府为吸收欧美文化,推进“教育的近代化”,专门设立了“文部省”,并于次年公布了新的学制。新的学制中明确规定,6-9 岁的小学生要“唱歌”,14-16 岁的中学生要学习“奏乐”,由此拉开了日本近代音乐教育的序幕。明治十二年(1879),伊泽修二率先向文部省申请设立了“音乐取调挂”。“音乐取调挂”的设立旨在和洋折衷、创作新曲,培育国乐人才,推动学校音乐教育实施。“音乐取调挂”成为推动日本近代音乐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伊泽修二、梅森、铃木米次郎等人成为日本著名的音乐教育家。

日本现代音乐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洋音乐的接受态度,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音乐的路径由此出现明显转向。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现代音乐运动风起云涌,此时也正值中国留日的高峰。受日本音乐运动的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在耳濡目染之下开始投身现代音乐运动,并将其时在日本大为流行的西方音乐知识译介回国。观察国内的出版市场,1906 年前音乐教科书出版种类还相对较少。留日的曾志忞当时感慨:“音乐教科书,今全国仅有二三种。且此一二种,又出于极脆弱、极单薄之手。于此而欲语普及,云何可期。”^[14]1906 年起,音乐教科书出版数量迅速增长,并在 1906,1907 年两年间出现出版小高峰。两三年间,各类音乐类教科书蜂拥而出。王国维观察说:“二三年学校唱歌集之出版者以数十计,大都会之小学校亦往往设唱歌一科。”^[15]可见清末音乐教科书出版之盛。

据不完全统计,1904 年至 1911 年间,除传教士所编音乐教科书外,国内各类音乐类教科书至少有 42 种之多。这些音乐教科书,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各类音乐教科书借鉴编译而来。有学者就统计:“从 1903 年至 1907 年,仅 4 年时间,主要由中国留日学生编创的学校唱歌集就达 23 册,收集近 500 首乐歌。”^[16]日译音乐教科书占据音乐教科书市场的主体,这提示晚清音乐知识的来源出现了重大转向,日本逐渐取代英美成为近代音乐知识传播的主要来源。清末出版的日译音乐教科书主要分为乐理类教科书与歌曲类教科书,兹分述如下。

(二) 晚清出版的日译乐理类教科书

乐理类教科书旨在讲授西方音乐基本理论。清末国内出版的乐理教科书基本全由日本乐理教科书译出。1904 年,曾志忞翻译出版了近代第一部音乐理论教科书《乐典教科书》。该书原是英国拜耳所选编《学校音乐理论教科书》,后由日本高等师范学校铃木米次郎译为日文,并改名为《音乐理论》,经日本文部省审定作为全国教材。曾志忞留日期间师从铃木米次郎,曾使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因而直接从铃木米次郎日译本翻译而来^[17]。中译《乐典教科书》定价大洋一圆,由日本东京三协合资会社印刷,上海广智书局负责发行。作为系统介绍西洋乐理的一本著作,《乐典教科书》出版后受到中国音乐界的追捧,成为清末日译音乐教科书的经典之作。此后民初曾有数种改编的音乐理论教科书,多沿用此书为底本,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表1 清末乐理类教科书一览表

时间	编译者	著作名称	备注
1904年	曾志恣	《乐典教科书》	原系英国拜耳选编《学校音乐论理教科书》，后由铃木米次郎译为日文，改名为《音乐理论》。
1905年	陈邦镇	《音乐学》	据铃木米次郎的乐理讲义编译而成，湖北省师范学校学生教科书。
1906年	黄子绳、权国垣等	《乐典教科书》	湖北学务处发行。
1906年	辛汉、伍崇明	《乐典大意》	原著铃木米次郎，东京自醒堂出版。
1906年	倪觉民	《初等乐典教科书》	原著为日本山田源一郎及多梅稚合著的《初等乐典教科书》。
1907年	徐傅霖、孙揆	《中学乐典教科书》	原著田村虎藏，上海商务初版于1907年12月，价3角，师范学校及中学校用。1913年4月第7版。
1908年	沈彭年	《音乐教科书：乐理概论》	国人自编，内容多取自日人乌居忱氏音乐理论，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中学及师范专用。
1909年	李燮义（剑虹）	《乐典》	中国集成公司出版，主要据日本东京音乐学校讲授内容编辑而成，每章后附“练习课”。

除曾译《乐典教科书》，1905年至1909年间，陈邦镇、黄子绳、辛汉等留日学生纷纷加入翻译队伍。表2整理了该时期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乐理教科书，可见该时期在国内掀起了音乐理论教科书编译出版的一个小高潮，这些作品多为清末的中学、师范学校使用。这些乐理著作皆由日本译入，多系日本当时流行的音乐理论著作。这些著述在内容、结构上不乏相通之处，理论体系自成系统，不但形成了出版上的垄断，更形成了相对独立、前后贯通的语言和知识体系，对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清末乐理教科书的广泛采用，至少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对西方音乐理论已有较为系统性、普遍性的认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开始真正起步。

（三）清末出版的日译歌曲类教科书

除乐理类教科书外，清末还大量出版过歌曲类教科书。歌曲类教科书多由各种学堂乐歌组成，主要为不同程度的学生提供歌唱词曲。这类教科书的出版与晚清学堂乐歌的流行密切相关。随着晚清教育革新，新式学堂在20世纪初广泛建立，音乐艺术也被赋予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重任。受军国民思想洗礼，学堂乐歌在晚清迅速流行。歌曲类教科书为学堂乐歌运动提供了基本的知识准备，学堂乐歌运动也反过来刺激了此类教科书的流行。目前所见，晚清最早出版的歌曲类教科书系曾志恣1904年5月出版的《教育唱歌集》，该书出版后反响极佳，至次年9月已连续4次再版。

继《教育唱歌集》发其端后，沈心工、辛汉、黄子绳等留日学生也纷纷投身歌唱集的编纂队伍，编译了多种歌唱集作品。重要者如1904年沈心工编译的《学堂唱歌集》，1905年黄子绳编译的《教育唱歌》，1906年王季梁、胡君复编译的《唱歌游戏》、辛汉编译的《中学唱歌集》、倪觉民编译的《女学唱歌集》等。据1907年《教育季报》所示，是年商务印书馆选定初等小学各科目单中，即有《小学唱歌教科书》（系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唱歌游戏》两种入选。上述几种乐歌集在清末都较为盛行，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伴随着学堂“乐歌”的兴起，一大批教授唱歌的音乐教科书以及各类学堂乐歌集得以迅速出版，很快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充满时代话语的音乐出版物市场。

考察清末日译歌曲教科书的曲目与内容,不难发现其底本多出自当时日本著名音乐教育家之手,深刻反映出近代音乐知识“转译”的特征。清末所译歌曲类教科书多是从日本音乐教育家铃木米次郎、田村虎藏、石原重雄、山田源一郎等人的著作中译出。以铃木米次郎为例,由于曾志忞、沈心工、辛汉、华振等留学生都曾在东京追随铃木米次郎学习音乐教育,因而铃木米次郎的著作被广泛编译引入。诸如《乐典教科书》《音乐学》《乐典大意》《风琴教科书》等多部作品都直接被编译作为清末音乐教育的教材。不仅如此,铃木米次郎还曾亲赴中国讲学,为辛汉等人的译作校阅或作序。由此,铃木米次郎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观念一度成为晚清音乐教育的“经典”,使得中国现代音乐带有典型的日译特征。这种底本“集中”的特点虽然有视野较为狭隘的不足,但也有体系相对系统,内容彼此关联,通俗易懂的优势,因而更易获得普遍的认可。

清末日译音乐教科书大多由留日学生群体编译,跨传播的代理人(agent)由早期的传教士转换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因而其传播体现为中国知识界结合中国实际有选择性、指向性的主动接受过程。这些编译者大多在20世纪初期负笈东洋,其中的佼佼者如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辛汉、华振、路黎元等人,大多是中国近代音乐兴起的关键性人物。此处仅以为学界了解较少的辛汉为例略作说明。辛汉系江苏江宁人,清附贡生,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回国后,历任清政府民政部主事,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等。辛汉对音乐极感兴趣,对音乐教育非常热心,他先后编译的音乐教材包括《唱歌教科书》《中学唱歌集》《风琴教科书》等。其作品出版后,曾风靡一时,多次再版,甚至出现“盗版翻印”的情况。铃木米次郎称赞辛汉编译的《唱歌教科书》“修辞雅饬,选曲精当”,说该书“出版不数月而重印数次”^[18]。辛汉在1906年出版的《中学唱歌集》中还专门附录了一篇《刻唱歌集诸君鉴》,称“屡有采取鄙著者”,恳请以后“勿庸齿录”^[19],可见其编译作品流传之广。

日译音乐教科书是西方音乐知识输入的重要方式与关键阶段。作为近代中国音乐知识生产的重要源头,日译音乐教科书对中国现代音乐运动意义重大。日译音乐教科书的集中编译成为晚清音乐界引人注目的奇观,它不仅为晚清的学堂乐歌运动提供直接的理论和知识工具,更新了晚清知识界对现代音乐的认知观念,同时也转变了现代音乐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路线。

三、清末西方现代音乐知识的本土转向

清末日译音乐教科书带有浓厚的日本音乐教育风格。不过随着晚清学堂音乐教育的推行,商务印刷馆等近代商业出版机构对音乐教育的关注与介入,清末几年间中国知识界自编音乐教科书开始不断崛起。清末音乐知识的生产由“单向传播”转向“主动接受”,教科书的出版也由纯粹的外译步入翻译、创制并举的阶段,清末音乐教科书出版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转向特征。

(一) 清本教科书出版机构的本土转向

清末音乐教科书出版的本土化转向首先表现为出版机构的本土化。清末年间,音乐教科书逐步从日本出版转到国内出版。早期日译音乐教科书在编译过程中,不少编纂者还在日本留学,鉴于国内其时印刷条件限制,这些教科书早期往往多在日本印刷,印刷好之后再销运国内,由国内的出版发行机构代为发行。例如最早的歌曲类教科书《教育唱歌集》就是由日本东京浅草黑船町榎本邦信承印,并木活版所印。《教育唱歌集》出过洋装面布、洋装纸面两种规格,前后几个版本都由这家印刷所印制。此外,江苏宁属学务处1905年发行的《音乐学 体操》、1906年辛汉编译的《中学唱歌集》也都由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制。日译教科书编译的初期阶段,由日本印刷出版再交国内发行的情况非常普遍。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盛行,教科书需求旺盛,特别是在商务印书馆、科学书局、文明书局、普及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敏锐

地察觉教科书出版巨大的商业利润后,音乐教科书的印刷出版随之迅速转至国内。

商务印书馆自清末开始涉足教科书业务,并由此成就商务印书馆的迅速发展。据统计,1901年至1910年间,商务共出版各类图书865种,其中艺术类图书23种^[20]。早在1905年,商务印书馆就创办了小学师范讲习班,“学额六十人,以简易方法讲习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理化、算术、唱歌、图画各科以及养成小学教员。”^[21]1905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了华振编著的《小学唱歌教科书初级》。1906年复又出版王季梁、胡君复编译的《唱歌游戏》,叶中冷所编晚清第一部《手风琴教科书》。1907年出版徐傅霖、孙揆编译的《中学乐典教科书》,陈俊等译编的《小学唱歌教科书》,叶中冷编《女子新唱歌初集》,胡君复、叶中冷合编的《女子新唱歌集二、三集》,1909年出版胡君复《新撰唱歌集一至三编》等书。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不仅出版音乐教科书,馆中编辑也直接参与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晚清音乐教科书编译中贡献颇大的胡君复便是商务印书馆编辑。

清末音乐教科书的大量出版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既有学堂乐歌运动的推动,更不乏商务等本土出版机构“生意”的运作。音乐教科书的大量出版以及商务等本土出版机构的大力推动,事实上都暗示了该时期社会广泛的现代音乐需求。这些音乐教科书的出版与学堂乐歌运动相互配合,从而激发了现代音乐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

(二) 清末音乐类教科书国家意识的觉醒

晚清音乐教材在普及音乐知识的同时,也成为近代知识界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教材编纂方面,除了留学生自发编译外,晚清还出现了官方音乐教科书,直接反映清政府官方试图通过音乐歌咏的形式灌输其意识形态。1907年,清学部编译图书局出版《初等小学乐歌教科书》,该书是第一本官方编纂出版的音乐教科书,专门供初等小学之用。作为清官方颁行的教材,学部为普及推广,特允许翻印,并在书封底附印有《学部允准翻印初等小学教科书教授书章程》^[22]。除学部编译的音乐教科书外,清末地方也有类似的官方教科书。同在1907年,路黎元即协助张之洞编撰了《鄂督张宫保新制学堂唱歌》。路黎元系湖北武昌人,早年留学日本,留学归国后即在张之洞所办师范学校内教习音乐。路黎元所编该书,乐歌歌词多由张之洞所做,谱曲则由路氏完成,最后由路氏完成编订。这些官编教科书本身蕴含的“修身、救亡和报国”教育思想,体现了清政府“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同时也与清末初兴的“国家主义”音乐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收回教育权、养成健全人格、铸就国民的国家观念以及提倡学习古曲、继承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3]。

从内容看,虽然清末的乐理主要系由西方舶来,但乐歌创作则呈现出明显的本土特色,反映出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与乐理教科书不同,唱歌教科书中的不少乐歌都由编者自创。他们一方面把西方流行的歌曲和乐曲曲调翻译引入,另一方面则在乐歌中加入了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内容,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形成紧密互动,由此将音乐教科书作为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例如沈心工创作了《兵操》《革命军》《美哉中华》等脍炙人口的乐歌,多体现抵御外侮、富国强民的主旨,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时不少学堂乐歌都对中国传统音乐抱较否定的态度,主张抛弃“无进取之志”的旧乐,以积极、爱国、向上的音乐涵养德性。而面对清末乐歌全盘西化的浪潮,李叔同等则强调以中国传统诗词与现代曲调的结合,探索近代音乐教育的新路。李叔同专门编辑出版了《国学唱歌集》,这部唱歌集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用古文填写歌词,意境深远、韵味悠长,鲜明体现出乐歌创作的本土化转向,也反映出在对西方音乐的接受过程中,知识界自我反思与自我选择的自觉意识。沈心工、李叔同等近代音乐学家结合中国固有文化,汲取西方音乐理论之精华,营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音乐学科,构建了中国近代音乐学基本的知识体系。

四、结 语

中国音乐学学科的确立是近代中西音乐学彼此交融的产物,中国音乐学科的确立与引进、吸收和融会西方音乐学术话语、知识体系密不可分。在此过程中,晚清音乐教科书的出版与流行为近代中国音乐学科的奠立铺垫了道路。回溯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历程,晚清音乐教科书的出版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最初是英美传教士为宣扬宗教,满足圣诗传唱和教会学校音乐教育而零星出版的音乐教材,这类教科书多在教会内部使用,事实上未能在中国知识界造成较大的影响。20世纪初,清政府修立学制推行新式教育,学校音乐教育始得初兴,留日学生将日式各级音乐教科书大量翻译出版,由此造成了晚清日译音乐教科书出版的高潮,日译教科书也由此成为西方音乐中国化的基础和典范。此后,随着学堂音乐的推进,商务印刷馆等民营商业性出版机构的介入,音乐类教科书迅速本土化,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教科书迅速得以普及,成为推动近代音乐教育和学堂乐歌运动的重要力量^[24]。正是这三种知识资源的范式交叠、跨界拓展,进而彼此交汇,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音乐学的创造性成长。

晚清音乐教科书的出版历程,清晰揭示了中国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历史脉络,反映出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复杂性、偶然性。就音乐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来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宗教信仰、民族主义、商业主义等不同的因素混杂其间,近代音乐知识生成过程中所倚靠的文化资源也各有差别,近代中国音乐知识生产的文化路径提示了中国音乐学科发展的诸多源流。晚清音乐类教科书的编纂出版不但深刻反映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话语脉络,也清晰指示出这一脉络中隐藏的东、西洋文化权力竞争。厘清蕴含于晚清音乐教科书背后的学科、话语与知识脉络,深刻把握近代以来音乐理论的跨语境实践,这无疑有助于重思当代音乐理论的范式交叠与跨界拓展^[25],对于增强学术自信、构建中国特色的音乐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王次炤. 语言、概念、跨学科和中国文化精神:关于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几点看法[J]. 音乐研究, 2018(4):5-8.
- [2] 赵庆文. 清代新教赞美诗集的编译(1818-1911)[J]. 宗教学研究, 2012(4):202-209.
- [3] 黄时鉴. 宁波华花书房刊本知见略述[C]//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 2005.
- [4] 宫宏宇. 杜嘉德的乐理书系统与西洋乐理之东传[J]. 音乐研究, 2009(1):24-38.
- [5] John M. Douglass. , *Memorials of Rev. Carstairs Douglas,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t Amoy, China* [M]. London, Waterlow & Son. 1877:10.
- [6] Helen S. C.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M]. New York: Hurst and Company, 1891:40-41.
- [7] [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江南传教史(第二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 [8] 宫宏宇. 基督教传教士与西国乐法东渐:从傅兰雅的教学实践看“主音匮乏”教学法在晚清的传播[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12(3):4.
- [9] 孙继南编著.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2.
- [10]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 [11] 毕苑. 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文化转型[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 [12]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3] 傅兰雅. 声学须知[M]. 上海:光绪十三年木刻本,1-2.
- [14] 曾志忞. 音乐教育论[J]. 新民丛报. 1906(12):57。
- [15] 王国维. 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J]. 教育世界,1907(148):1-2.
- [16] 马达. 二十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1.
- [17] 曾志忞译补. 乐典教科书[M]. 上海:广智书局,1904.
- [18] 铃木米次郎. 序[M]//辛汉. 中学唱歌集. 上海:上海普及书局,1906.
- [19] 辛汉. 刻唱歌集诸君鉴[M]//辛汉. 中学唱歌集. 上海:上海普及书局,1906.
- [20] 汪耀华. 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M]. 上海:上海书店,2017:246.
- [21] 各省教育汇志[J]. 东方杂志,1905(11):5.
- [22] 孙继南. 中国第一部官方统编音乐教材:《乐歌教科书》的现身与考索[J]. 音乐研究,2010(3):5-12.
- [23] 程征. 从官编音乐教科书看清末“国家主义”音乐教育思想的初兴[J]. 中国音乐,2022(5):174-182.
- [24] 胡杨,陈时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艺术教育课程的嬗变与启示——基于融合美育的视角[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47-55.
- [25] 王旭青. 当代音乐理论研究的范式交叠与跨界拓展[J]. 音乐研究,2022(11):5-12.

The Generation Map of Modern Music Knowledge: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Publishing Path of Music Textboo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o Qingwe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music discipline and knowledge system, music textbooks played a key role. During the publishing process of modern music textboo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usic textbooks went through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from sporadic publication by British and American churches, to the compilation of Japanese translated textbooks as the main body, and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extbooks in China.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discourse context of the generation of modern music knowledge, but also indicate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power hidden in this context.

Keywords: music textbook; Late Qing Dynasty;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责任编辑:刘力]